

“双一流”建设的重心在学科

王洪才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双一流”建设拉开了中国大学发展的新序幕,它朝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前进。建设“双一流”需要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痼疾,需要去量化思维,去行政化思维,去追赶型发展模式,需要尊重学科发展规律,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实现这一切无疑都寄希望于超一流的大学校长的诞生。

关键词:“双一流”;中国大学模式;超一流大学校长;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6)01-0007-05

一、建设“双一流” 圆一个中国梦

“双一流”专指“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出自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建设“双一流”就是想彻底改变传统中国的积贫积弱局面,圆中华儿女的腾飞梦:实现国富民强,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梦最初来自 170 多年前的那场噩梦。1840 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古老中华帝国的沉静,使这个昔日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国度一夜间沦落到任人欺凌的地步,而且被加上了“东亚病夫”的印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华儿女才开始了变革图强的抗争,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无不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强不息的发展道路才真正开始。“两弹一星”的成功震惊了世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确立了。但中国还不是强国,还需要百倍努力。正当我们壮志满怀去建设现代化之际,却发生了十年动乱的悲剧。在结束动乱之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才开始续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然而,要清除十年动乱产生的思想混乱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践也需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因此,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才正式提出重点建设 100 所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标准的大学的

收稿日期:2016-01-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学创新教学理论与实践机制构建”(15JJD880014)

作者简介:王洪才(1966—),男,河北永年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

引用格式:王洪才.“双一流”建设的重心在学科[J].重庆高教研究,2016,4(1):7-11.

Citation format: WANG Hongcai. Subject is essential to the building of “double world-class”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16, 4(1): 7-11.

目标,这就是“211工程”(以下简称“211”)。20世纪末,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设想,这就是“985工程”(以下简称“985”)。这两个工程涉及面广,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今后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重大事件。

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逐渐形成。无疑,这与中国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确立,也使得周边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正视目前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于理性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要保持自己的发展步骤不被外部势力干扰,自然需要自身力量继续增强。而强大的真正力量从哪里来?必须从开发智力和知识创新上来,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基本共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增强国力中的地位。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是在贯彻这样的发展方针。重视教育同样如此,因为教育影响人才,影响智力。我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是出于这个基本设想。“211”“985”,还有优势学科建设等举措,乃至“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等,都是从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而言的。可以说,“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规模的高等教育大国,无论是本科生规模还是研究生规模都已经超过了长期作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我们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人们习惯用世界大学排名来阐释高等教育的强弱,如果以此指标来衡量,那么我们不仅与美、英、德、法等传统的欧美强国存在差距,而且与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也存在很大差距。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距,这是我们亟待分析的问题,也是今天建设“双一流”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建设“双一流”需要与“去行政化”同行

毋庸置疑,“双一流”建设与“985”“211”之间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双一流”就是对“985”和“211”的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曾几何时,当“211”特别是“985”刚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寄予了非常高的希望。可以说,“985”代表了中国人的雄心壮志,代表了国家对教育的希望,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希望。光阴荏苒,“985”提出将近20个春秋了,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流大学的一些踪迹,如北大、清华被一些国际大学排行榜排进了前100名乃至前50名,但国人对此似乎并不满意,这说明一流大学建设与人们心目中的真正一流距离尚远。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些重点工程建设的一些负效应,如大量资源向少部分高校集中,高校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化趋势等。正是在资源分布的集中化过程中,大学教授似乎是被金钱绑架了,失去了学术自由,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气馁的。于是学术界就出现了“去行政化”的呼声,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到钱学森之问提出后,声浪达到了最高点。这说明,我们在建设“985”的具体举措上出了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对于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就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其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提出来,似乎是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解。

然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并不那么简单,并非随着大学章程的颁布就一蹴而就了。许多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虽然建立了,但并未真正改变大学教授话语权缺失的状况。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应模式,虽然一切都可以在程序上做得完美无缺,而在实质内容上并未发生真正变化。这就让人感到苦闷,难道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吗?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如何具体迈进呢?正当人们处于观望之际,教育部出台了建设“双一流”的计划,它也试图回答人们的疑虑。

“双一流”建设规划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过去在“211”尤其是在“985”建设过程中的弊端,如身份固化、缺乏竞争等问题。事实上,为了进入“985”名单,许多大学都进行了残酷的竞争,而一旦进入名单,似乎就进入了保险箱,一切资源获得就顺理成章了。这大概就是身份固化的结果。高校为了显示自己的建设成绩,采用各式各样的手段,但核心都是以行政意志为主导的,学者的意志被严重弱化,甚至使学术的价值边缘化,这就形成了“985”建设之痛。这个伤痛包含了教学地位的弱化,因为大学为了提高学术排名,就必须突出科研成果和强化科研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把教学排在后面。虽然不少大学都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却很难。当教授失去了学生,学术就成了机械劳动;而当学生失去了老师,学习就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苦役。今天大学中普遍出现的浮躁情绪,与大学中的学术导向偏颇不无关

系。要矫正这种不良风气,大学必须强化以育人为本的宗旨,但要落实这一宗旨,就是对大学领导人政绩观的考验。

实事求是地说,教学与科研两者之间决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科研与教学本来是一个紧密的结合体,因为科研必须进行相互质疑和批判,而教学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相互质疑和批判的环境。学生就是教师需要说服的对象,说服学生既是一个教学过程,也是一个科研的促进过程。所以,将科研与教学两者机械地分开,其结果就是两败俱伤,那样的科研未必是真正的科研,当然教学也不是真正的教学了。相反,两者结合则相得益彰,教学得到了科研的滋养更具有生命力,而科研得到了教学的帮助则增加了可靠性。不难想象,这里的科研是真正的科研,而非单纯的论文发表,特别是花钱发表。对于没有科学价值的论文,无论发多少都无法提高学术影响力,甚至会成为学界的笑柄。许多高校的重奖论文发表、重奖科研课题等倾斜政策,已经使不少教师走火入魔。可以说,今天的大学已经深深染上了追求论文GDP、课题GDP的病症。

三、建设“双一流”的基点是尊重学科发展规律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首先就要消除流行的量化思维的发展观。但要消除这种量化思维的发展观,当前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它确实考验人们的智慧。这就要求把大学建设的基点落实到学科上。按照这个思路,必须实施学科与大学分离的政策,即政策导向是面向学科,而非面向大学。因为如果投资政策仍然是面向大学的话,就容易导致大学的权力集中和滥用,导致大学领导人更强的行政化思维,更加不讲究科学管理,更加青睐简单的量化管理模式。如果把发展重心下放到学科,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大学权力层对学术发展的干预。所以,学科与学校分离的发展模式是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模式。

然而政策的转向是一步步实现的,很难急转弯,那样可能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可以说,国家发展政策从大学层面向学科层面转移,实质上也是倒逼大学内部要放权,不能再实行简单化、机械化的管理了。这种激发学科发展活力的思维模式也有助于实现学科之间的横向联合,否则,大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还是处于相互封闭状态。这种以学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可以称为中位管理原则^[2]或中间突破策略。

所以,“统筹推进”的真正意蕴是:过去是强调大学整体发展,重心不在学科上,或者说对学科发展关注不足,现在要实行双重心,既要发展大学,也要发展学科,其关键点是学科与大学是可以分离的。在过去,因为采用一种集中化的发展路线,所以一个大学要想发展,就必须首先成为重点大学,然后获得重点投资。一旦列入重点投资名单,学科也容易变成重点了,因为它获得了难以匹敌的发展条件,特别是在讲究量化评比的环境下。那些不能进入重点发展名单的大学,学科整体实力就呈衰败之势。这也是今天大学竞争白热化的原因。但这种竞争并非真正的学术竞争,而是一种名分之争,或者说是一种资源之争。说到底,这是一种恶性竞争,而非促进学术生产的良性竞争。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恶性竞争,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想当然地认为,一流大学就是各个学科都要达到一流才能称其为一流大学,否则就不配。这种思维模式确实存在一个误区。众所周知,任何大学的学科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般齐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学科生态效应问题。作为强势学科,一般需要历史的积淀、行政的支持、良性的文化,从而能够人才辈出。没有这些基本要素,一个学科想挤进一流是困难的。任何学校都不可能平均用力,而是有自己的重点,或者说都有自己的偏好。这种偏好与各学科在学校中的地位或势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一个学校的学科生态形成需要若干年,一旦形成又要维持若干年,如果想改变又需要若干年,可以说要建设成功一个优势学科是不容易的。虽然现在不少学校采用外科手术的方式进行移植,将其他学校的王牌学科一锅端来成为自己的强势学科。这个做法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成功,原因在于学科发展需要一个生态环境,在过去学校环境氛围下能够成为强势学科,而在新学校环境下就不一定能成为强势学科。即便是采用各种资源集中的策略,这种策略也只能发挥短期效应,长期而言仍然需要文化传统发挥作用。而且外部过分干预的结果可能导致学科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传统优势学科地位的丧失,其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这说明,建设一个超强或全能的学校是不可能的,即一个大学在逻辑上只能部分学科是一流的或超一

流的,其他学科不可能达到一流或超一流水平。当然,在一个总体一流的氛围下,其他学科也不至于完全掉入二流或三流水平,多半是在一流与二流之间的水平上徘徊。一般而言,一流学科的自主性比较强,它不可能是行政交办的产物,虽然行政可以集中大量的资源进行支持。往往越是强势的学科,在学校中的声音越大,自主性也比较强。虽然不可能超越总体的行政框架,但行政对于这些学科往往是支持的多,拒绝或否定的少,从而使这些学科能够锦上添花。相反,弱势学科在学校中的声音比较微弱,有自己的主张也不受重视,难以获得雪中送炭的支持。

故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就说明在政策支持上可以将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进行适当分离。换言之,即使一所大学在整体上达不到一流水平,也不妨碍部分学科可以达到一流水准,甚至个别学科达到超一流水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学科发展是与独特的资源优势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藏医药研究和藏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在西藏大学实现超一流的发展,因为别的地方无法与之进行独特的地理资源和人文资源竞争。同样,对一流大学而言,必须允许其相当部分学科并非是一流的。当然,其大部分学科应该达到一流水平,否则就难以保证其整体水平是一流的。可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明智的,同时也是比较宽容的。这样才能够使大学在建设一流过程中不至于过度焦虑和急于求成,也能够给更多的大学以希望。换言之,以后大学的发展竞争以学科建设为重点,而不是盲目地竞争一流大学的名号。

在过去的一流大学建设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而且大量的资源配置存在着浪费惊人的现象,最终导致在建设过程中的同质化。与其他大学相比,重点大学获得了难以竞争的优势地位,各种资源分配都与固有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大学之间恶性的资源竞争而非学术实力竞争,继而各种学术腐败现象丛生。这一切都是传统的资源配置以行政意志为主导的结果,没有真正发挥学术市场的力量。学术市场自身应该是一种良性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它应该在遵循科学规范和学术影响力的条件下发生作用,如此它与行政权力所施加的影响是有区别的。行政权力具有不可置疑性,而学术市场则是在理性的申辩过程中进行的,没有什么独尊的权力,这样就可以进行公平竞争。

这也说明,未来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应仅仅是行政意志的体现,也应该是一种学术意愿的表达过程。为此就需要把学术发展的外在驱动变成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这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长久之道。

四、建设“双一流”需要超一流的大学校长

从根本上说,建设一流大学需要构建一个独特的大学模式。有了独特的大学模式,就不再是个别大学挤进一流大学行列了,而是一个大学群体进入一流行列。传统一流大学建设的最大误区就在于运用了“追赶型”发展模式,该模式就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方式进行模仿,从而出现表面上似乎与世界一流大学趋同,而在内在气质上却与世界一流大学迥异的现象。说到底,这种大学是不接地气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的,甚至形成了更大的发展焦虑,造成更强的行政化。所以,真正建设一流大学的道路是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特色当然是要基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一致,这样才能真正激发教授们的创新动力。如果不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入手,仍然走模仿型发展道路,势必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渐行渐远。

当然,建设中国大学模式也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中国大学模式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一种精神沉淀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价值认同的过程。这个精神就是大学共同体的精神。没有这个沉淀过程,中国大学模式就不可能出现。谁是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执行者?无疑是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显然不能是一个泛泛之辈,不能仅仅是一个官僚,必须是很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是一个真正读懂大学的人,是一个真正具有普世情怀的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实践家。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意味着他在政治上是可信的,没有这一点,他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真正读懂大学可不容易,这意味着他必须读懂学术发展的规律,洞悉知识增长的真正规律,这就意味着他的哲学修养是非常深的,即他明晰大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明晰其中的相互促进关系,明白大学就是一个共同体,是不可能相互分离的,所以他的志愿就是促进知识的整合,从而促进知识的创新。换言之,他不忙于采用外科手术来发展学术,因为那样做是对学术的庸俗化,是对学术价值的自我贬抑。他是一个具有普世情怀的人,意味着他不是为一个专为自己政绩忙的人,不是专门为了自己的乌

纱帽。忙于自己乌纱帽的人,直接表现就是突出自己的政绩,建立自己的帮派,然后为所欲为。具有普世情怀,意味着要解决普罗大众的关怀,解决社会民生发展大计,满足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真正的实践家,就是不要只说漂亮话和作秀,而是要言出必行,言行一致,以实践兑现自己的承诺。

一流大学固然需要一流学科,但更需要超一流的大学校长。没有超一流大学校长创造出良性的机制与氛围,就无法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有人说,一流学科只要引进“大牛”专家就可以了。这显然是一种应景策略,而非长远发展大计。从眼前看,“大牛”专家的引进,虽然把一些数字做漂亮了,但这是否有助于建设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呢?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这能否持久呢?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持久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宜的土壤,如果土壤不适宜,学科发展焉能持久?一个学科需要学术带头人建设,而整个学科群由谁来培植呢?只有大学校长才能承担这个责任!

只有大学校长才能推动大学整体学术氛围的建设,促进学术良性发展机制的建立。因为即使引进“大牛”专家也需要配套的制度,需要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需要一个平等对话的空间。仅靠一些特殊政策,决非长远之计。学术探究的本质是平等对话,只有平等对话才有自由探索,有自由探索才可能有创新。只有在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允许差异,没有差异,就不可能有创新。因为在允许差异的状态下,新观念新见解才能生存并获得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正是如此,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条件,而平等则是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权威化的条件。在行政化氛围浓重的今天,谁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只有校长的大胆作为,亲身示范,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双一流”建设才能成功。

好的大学校长的实质就在于他能够培育一种良性的大学文化,使大学真正崇尚求真务实精神,真正把知识追求放在首位,真正能够把大学的作风引向严谨求实上^[3]。不客气地说,现在大学离开严谨求实的轨道太远了,已经使大学人失去了精神的归宿,成为了灵魂的漂泊者,原因在于校长本人的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使大学失去了大学精神。如果校长本人这些举动受到了奖赏,那么就会演变成一种不良的校风,也最终会形成一种不严谨的学风。而学风和校风就是大学的文化精神,它对大学的发展影响是长久的。

显然,不改变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不能建立对校长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就难以诞生超一流的大学校长。而超一流的大学校长的诞生则是建设“双一流”的寄托所在。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 (2015-11-05) [2015-12-3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 [2] 王洪才. 论大学内部治理与中位原则[J]. 江苏高教 2008(1):5-8.
- [3] 王洪才. 大学校长:角色·使命·选拔[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26-48.

(责任编辑 蔡宗模 陈虹蓉)

Subject is Essential to the Building of “Double World – class”

WANG Hongcai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Double World – class” begins the new starting – poi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lead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Great China Dream. To construct the “Double World – class” needs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 with the de – quantitative thinking, de – administration thinking, de – catch – up thinking, and the development rule of subject should be respect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university mode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l those call for the birth of top – level university presidents.

Key words “Double World – class”;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 top – level university presidents; China Dream